

愈炸愈坚：重庆大轰炸之下渝中半岛的城市建设（1939-1941）

杨哲¹

(1.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 昆明 10691)

摘要：1938—1943年间，日军对战时首都重庆展开了近六年的战略大轰炸，给处在渝中半岛的母城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上下城区屡遭炸毁，城市基础设施遭到空前严重的打击，给城市与人民造成了极其惨重的生命财产损失，使得城市的正常演进中断。但在客观意义上，大轰炸使得重庆母城获得了彻底改造重建的机会。在艰苦奋斗下，重庆母城的城市布局与城市形态得到改善，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得到提速，为之后的城市建设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重庆大轰炸；城市史；城市建设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356

引言

重庆大轰炸是抗日战争史中重要的历史事件，是苦难沉重的民族历史记忆，更是中国人民不畏日军淫威奋勇抗战的真实写照。重庆大轰炸是一个空间上的概念，轰炸范围包含了以战时首都重庆地域为中心的核心区，重庆防空司令部对空监视的监视区，以及作为重庆战略防御重要组成部分的外围区^[1]；同时，重庆大轰炸也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以1938年2月18日日军飞机空袭巴县广阳坝机场为起点，以1944年12月19日日机轰炸梁山、万县、开县为终点，持续时间长达6年零10个月^[2]，时间跨度几乎涵盖了全面抗战，是研究西南大后方抗战的重要切入点。三十多年来，在国内外学者的辛勤耕耘下，关于重庆大轰炸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学者们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入手，共同构筑了重庆大轰炸研究的基本内容框架，使之逐步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标志之一。

若从城市史的角度出发，以城市建设的视角来看重庆大轰炸，就会发现这是重庆从近代化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关键时期。大轰炸虽然严重破坏了重庆主城的城市建筑，使重庆旧城遭到严重破坏，但也在客观上打破了旧有城市格局对城市良性发展的桎梏，解决了军政府时期未能解决的市政工程遗留问题，对今天渝中区的城市格局都有着重要影响。

本文将时间范围选定在1938-1941年，这是侵华日军对重庆进行无差别、疲劳式轰炸最集中的时期，也是重庆旧城改造、重建的关键时期，以此为切入点，更能从中了解重庆城市更生过程中基础性的措施，找到重庆现代化的历史演进脉络。本文将从重庆近代以来的重庆建设及破坏情况、大轰炸中的抢修、重建状况，以及这一时期城市建设所带来的影响。

一、重庆近代以来的建设状况以及大轰炸造成的城市破坏情况

（一）开埠以来渝中半岛的城市建设情况

从悠久的建城史来看，在相当长的时间段中，重庆的城市职能主要以政治为主，且更加强调军事上的功能。重庆城市的建设也主要服务于此，历史上几次以军事防御与稳定政权为目的主城空间扩展，使之逐渐形成了“周二千六百六十丈七尺，环江为池”、“门十七，九开八闭^[3]”。由山脊分上下半城的基本城市格局。至清朝前中期，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重庆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获得了发展的新机，商品经济走向繁荣，地区贸易得到增加，重庆逐渐成为了一个辐射“蜀西南北，旁及康、藏，以至滇、黔一隅”的重要区域性市场网络节点。商业人口的涌入、农副商品的汇集，促进了重庆由“城”到“城市”的转型。

作者简介：杨哲(2003—)，男，本科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通讯作者：杨哲

重庆城市的近代化始于开埠。1890年3月31日,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的签订,正式规定“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无异”,1891年3月英国控制的重庆海关成立开关,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此后,西方商品、资本以及生产方式进入重庆,促使川东地区农村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对传统城市的各方面都形成冲击^[4]。开埠通商为重庆城市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动力,城市建筑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以教会学校、医院为代表的宗教建筑快速增加;在五福宫一带由西方列强设立领事馆而逐渐形成的带有西式风格的领事巷;朝天门至南纪门下半城白象街一带商业金融区涌现了许多新建筑,汪全泰商号、大清邮政局、海关等商业和官方机构相继出现在临江的传统行政贸易区。这些变化正反映了重庆城市近代化初期土样混杂的特点。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加,人口压力带来了城市对外扩张和调整内部结构的动力,突破“九开八闭”旧城墙对城市空间扩展的束缚和改进城市内部基础设施、改善民众居住环境的需要与日俱增。在军政府时期,城市新区的开拓和旧区的改造提上了日程^[5]。

民国十六年(1927)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九年间的军政府统治,是重庆城市建设的重要时期。督办公署成立前的重庆,基础设施薄弱,交通、自来水、电力、下水道等公共事业亟需建设;房屋“如云而凌乱似丛”,街道“新市街迂曲狭隘,难于举步”,且交通极为堵塞。针对市政的诸多弊病,时任督办公署署长的潘文华开始了重庆城市的近代化建设,提出了开辟新市场和整理旧街道两项基本政策,并采取渐进方略确立四大原则:“1、积极开辟新市场,以为旧城内小商业及住宅此地推移之场合;2、先整理旧城街市,酌量推展宽度,以谋整齐市容,便利交流;3、公用事业以扶助民营发展为目的,就有基础者,建都其内容,对症施方,徐谋匡济。”由此开始了城区的改造。

在新市场的开辟中,市政厅通过对通远门外“由临江门沿嘉陵江达牛角沱,由南纪门沿扬子江达兜子背,袤广近三十方里”的“四十三万七千数百余冢”的坟地进行迁移,时坟地分为三区:“自通远门起,经观音岩、上下罗家湾以及两路口为第一区;自南纪门,经雷家坡、石板坡、燕喜洞、菜园坝、徐家坝以至冤子背右,与第一区相属为第二区;又自临江门,经双溪沟、宰房沟、大溪沟、张家花园、上清寺、曾家岩左,与第一区相属为第三区。”由于迁坟区域广阔,加之由迁坟工作而引发的官民利益冲突,历经六年之久完成此工作,为扩建腾出大于旧城区一倍的空间。在迁坟的同时,新市区交通干线的建设也提上日程,市政府拟定了新市区“一由通远门经两路口至曾家岩,约长六里;一由南纪门经菜园坝并科上接两路口,约长五里许;一由临江门双溪沟经孤儿院至曾家岩,亦长五里许”的三大干线,使其与旧城区交通延伸连接,以达到带动旧城和新区的协同改造发展的目的。

在旧市区的改造中,市政府将城墙拆除的工作放在了优先的位置,由朝天门开始,太平门、南纪门等次第拆除:“华洋杂处,来往人繁,而各城门类皆狭窄,以至行人进出,时形拥挤,对于交通,深为不便,敝署为便利交通起见,拟将各道城门逐一拆卸整理,以利通行,特先从朝天门着手,定于三月六号动工开拆。”由此封闭城墙的格局被打破,重庆的拥有了更多的城市空间与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市政府又先后“整理旧街道,使市场展宽,市面清洁,创修中央公园,使市民于工作之暇,得有休憩之所,又以本埠三面临江,水道交通,颇关重要,乃从事建修嘉陵码头、朝天门码头,以利商货之转输”,除此之外,重庆市政厅还计划筹备设立自来水公司,整顿电灯、电话设施,新修马路十道。以上措施使得重日市区的面貌有了较大的改善,为后续作为战时陪都奠定了基础。

(二) 大轰炸的破坏情况

为了摧毁大后方人民的抗战意志,迫使国民政府妥协投降,日军航空部队对中国大后方开展了大规模的战略轰炸,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受到的破坏尤甚。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的轰炸,自1938年2月18日首次空袭巴县广阳坝(今南岸区广阳坝)机场起,至1944年12月19日最后一次对梁山(今梁平)、万县(今万州)、开县进行轰炸止,轰炸时间长达6年零10个月^[1]。而其过程大致可划分为1938年2月至1939年1月的试探性轰炸阶段;1939年5月至1941年8月的日军大规模轰炸阶段;1941年9月至1944年12月的日军零星轰炸阶段三个阶段^[6]。长时间的轰炸使得城市遭到巨大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损失。其中以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和1940年的“八一九”大轰炸集中体现了轰炸的破坏性。

5月3日,日军出动第一空袭部队45架(中方调查为36架)狂炸重庆上午9时,日本海军45架96式中型攻击机从汉口机场起飞,以密集队形突袭重庆。轰炸历时1小时50分钟,明显带有以摧毁城市建筑、设施,轰炸平民,扰乱城市金融和商业,达到造成更严重的社会恐慌为目的。轰炸重点目标是重庆商业、住宅集中,人口密度最大之一的老城区下半城,以朝天门—陕西街—望龙门—太平门—储奇门一带为中心。日机共投弹166枚,其中爆炸弹98枚、燃烧弹68枚,在对重庆市区的轰炸中首次使用燃烧弹。中弹地点达36处,下半城有19条主要街道被炸成废墟,41条街道被炸起火。此次轰炸共造成人员伤亡1023人,其中死亡673人、重伤350人。炸、焚毁房屋846栋222间,直接损失达国币42万余元。5月4日傍晚,日军第一航空部队27架再度狂炸重庆市区。轰炸目标转移到重庆老城区上半城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共投弹126枚,其中爆炸弹78枚、燃烧弹48枚。又有36处地方中弹,有38条街道被炸,都邮街、柴家巷等10条主要街道全毁尽毁。轰炸造成人员伤亡5291人,其中

死亡 3318 人、重伤 1973 人,炸、焚毁房屋 2840 栋 963 间,被炸后的市区“七处由轰炸引起的大火很快蔓延开来,全市陷入火焰的包围中”。滚滚浓烟遮天蔽日,熊熊大火燃烧了近三天才被扑灭。上半城有 38 条街道被炸,丧心病狂的日军还在投弹时,“除抛掷星月牌毒质纸烟数十包外,并掷有白色棉花,在紫金门外,被一无知小孩拾得,手指顿时红肿,疼痛难忍。敌人之用毒物,残害我无事民众,已经证据确实。”该区商业集中,物资损失严重,仅都邮街一带被烧毁的绸缎布庄就达 15 家、绸缎 16 万多匹;全市 37 家私营银行、钱庄中的 14 家被烧毁。驻重庆的英法德使领馆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一次轰炸死伤 5000 人以上,这在人类战争史上还是第一次,也是整个重庆大轰炸中直接死于轰炸人数最多的一次。日军灭绝人性的暴行并未达到“使重庆政府屈服”以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目的,相反,惨烈的轰炸激起了激发了重庆人民无限的愤怒和仇恨,增强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而日军则展开了规模更大、次数更频繁且破坏力更为惊人的 101 作战计划。

101 作战计划实施是从 1940 年 5 月 18 日到 9 月 4 日,一共进行了连续 112 天大轰炸,共轰炸重庆市内 75 次,日陆军出动 21 批、904 架次,海军出动 54 批、3651 架次,共投弹 27107 枚,重 2957 吨。其中对重庆市区的空袭飞机达到 2023 架次,投炸弹 10021 枚,共计 1405 吨。5 月 26 日到 8 月 23 日的 90 天里,轰炸了 32 天,大约平均每 3 天就有一轮。8 月 19 日当天更是受灾严重。

8 月 19 日,日军出动第一联队 36 架、第二联队 53 架、陆空 35 架、战斗队(包括零式机)14 架、侦察 5 架共 143 架(中方调查为 135 架)两次共 4 批次狂轰滥炸重庆市区,日军还没有完成制式化的零式战斗机首次担任轰炸护卫任务。据防空司令部调查,第一次 9 架在市区枣子岚垭、罗家湾、国府路、飞来寺等地投爆炸弹 41 枚、燃烧弹 10 枚,造成 11 人受伤,损毁房屋 57 栋 91 间。第二次日军出动 119 架(内有驱逐机 9 架)分 3 批轰炸市区,此次轰炸日机共投掷爆炸弹 262 枚、燃烧弹 52 枚,两府路、大田湾、两路口、中二路、中华路、通远门、学田湾、都邮街、大梁子、初期门、瓷器街、较场口等地遭到毁灭性破坏,苏联大使馆再次中弹,《新民报》社被炸停刊;日军投掷新型汽油凝固弹 36 枚,引起巨大火灾,从较场口、都邮街、演武厅、大梁子向东一直烧到苍坪街,西边一直烧到十八梯以下,市区最主要的几条繁华大街被烧成焦土。轰炸造成 181 人死亡、132 人受伤,房屋损毁 643 栋 1180 间。八·一九大轰炸集中体现了日本陆、海飞行队“协同作战”后,轰炸规模与轰炸烈度的显著提升。日军在这一时间段中采取“无差别的、连续的、反复的、地毯式的、不分昼夜”的疲劳轰炸策略,并针对重庆城市建筑多为木质结构的特点,大量使用破坏力极大的新型凝固汽油弹和燃烧弹,重庆主城区多次化为焦土。

二、大轰炸时期重庆的城市建设

大轰炸使得渝中半岛的主城区遭到极大的破坏,居住区、商业区被炸毁的房屋不计其数,城区最繁荣的街道多次化为焦土。但重庆人民并未向日本侵略者的淫威屈服,在经历轰炸后,迅速组织起了应对轰炸的各种措施,并开启了修理和重建被炸毁的房屋及公共设施的各项工作。

(一)废墟上房屋的重建

重庆地狭人稠,传统民居多为吊脚楼、合院等。在成为战时首都后,大量人口的涌入加剧了这一现象,住房问题日益紧张,除少数人拥有宽敞的住宅外,市民很大部分人居住在被称为“国难房”的简易房屋中。这类房子十分简陋,多数是捆绑式的临时房屋,材料一般都是用泥土竹木,支架而成,采用簕桶的捆绑方式制作而成。建材为竹木结构,破败凄惨,摇摇欲坠,具有相当的临时性^[7]。

日军轰炸的对象不仅是重要工厂、物资仓库、首脑机关和军事设施等军事性场所,还将其范围扩展至城市的商业区、文化区、居住区等非军事场所,实行无差别轰炸,给城市建筑以毁灭性的打击,市民的居所损害尤甚,且历经多次炸毁,“敌机的毁灭路线是从曾家岩起,经过国民政府、大溪沟、张家花园、观音岩、七星岗,以至城内的。在这一条路线内的房屋差不多都毁灭净尽了。立在高处一望,但见五六处的大火,满眼破瓦颓垣,罩上一层灰土,通行大道变成了巨坑或小丘。”但重庆并未因此屈服,展开了官方政策、经济支持与民间自救两个层面的城市重建活动^[8]。

在宏观层面,国民政府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首先,国民政府颁布了系列法案在微观上支持民众的房屋重建工作。政治上,行政院颁布了《内地房屋救济办法》,规定奖励民众建筑私营住宅:一、由地方政府尽先完成通街道路及公用设备;二、三年为限的房租减半征收;三、建筑经费不足者予以介绍押款。《重庆市政府疏散区建筑房屋奖励贷款办法》也对居民自行建房奖励政策也进行了规定,若在建者自筹房屋建造款项不足,可由住户自行筹款 30% 的费用基础上,政府给予最高可达 70% 贷款支持建房。针对日军轰炸造成的房屋损毁,重庆市政府放松了对违章建筑的管控,以抗战实际需要为先,制定了《被炸灾区暂准搭棚办法》,准许民众在被炸地点就近搭建临时席棚居住。经济上,国民政府制定了《空袭紧急救济办法》,规定了关于房屋被炸救济具体措施,贫

苦难民房屋全毁者，每户发给救济费三十元；炸毁一部分者，救济二十元；震踏房屋，补助十元；对于住房被炸无栖身者，应予以收容，并于一星期内妥善安置。这为民间的自救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支持。

其次，国民政府在制定宏观的城市规划方案上做出了一定的尝试。1940年4月1日，重庆临时会议第二次会议召开，《重庆建设方案》提交会议审议。其内容包含建设前提、交通建设、经济建设等内容，并非单纯的城市建设，提出了“由立体发展而向平面发展”、“由以往一个中心之繁荣，而变为许多区之卫星式之繁荣”的设想。1941年2月18日，陪都建设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并与同年4月提交了陪都分区建设计划初稿，提出将重庆分为商业、工业、文化、住宅、风景等五个较为松散的功能区。但由于抗战在军事上对资源大量消耗、日军持续轰炸以及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等因素，这一时期的城市规划进展缓慢，对民间自救的指导作用也十分有限^[9]。

在微观方面，民间的自救行动是房屋重建的实际执行者与主要参与者。面对日军的猛烈轰炸，重庆人民不畏强敌，积极开展轰炸后的重建工作。“每一次空袭之后，人们就会从在岩石上凿出来的防空洞里走出来，立即开始清理被炸的现场，修补那些受损较轻的房屋，甚至重建那些已被完全炸毁的房屋。从那些完全被炸毁的房屋中，人们会捡出木材，拔出并敲直每一根钉子，并将它们仔细地储存起来，以便能够再次使用。每一个人都在工作，在繁忙的街道上可以听见经久不息的叮当敲榔头声和嗡嗡的拉锯声。”在共同遭受的轰炸之下，人们团结一心，互帮互助，许多救济服务团体积极行动，协助受灾人民进行“清理街道、挖掘掩埋、救伤...设临时收容所”等善后工作。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每年秋季到第二年春季，重庆多大雾，日军轰炸视线受阻，重庆便有了短暂的喘息之机，并会开始集中性的重建与改造，“从春天到夏天，日本人的飞机几乎把整座城市都炸成废墟。可秋天一起雾，日军轰炸一停歇，他们马上就在废墟里重建房子。这些房子第二年又被炸掉，可秋天一到他们又把他们重建起来。”重庆人民在废墟中一次次重建家园，在轰炸集中时抢修，在大雾锁城的时候利用天气条件补修与改造城市，不仅使重庆主城在轰炸中屹立不倒，还在精神上极大鼓舞了全国民众的抗日决心。

（二）火巷的开辟与建设

迁都以来，日军对重庆长期实行“无差别轰炸”、饱和式轰炸，上下半城城区几乎被完全摧毁。高烈度的战争往往会引起大规模的火灾，加之日军针对重庆建筑多为木质结构的特点大量投掷燃烧弹，重庆主城多次化为火海，给城市居民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因此，如何有效控制火势蔓延、如何最大程度减轻火灾对城市的破坏，成为了战时城市重建与改造的重点。国民政府借鉴宋代以来的防火经验，在炸毁的废墟中开辟火巷，以提高城市整体防火水平与能力。

1939年4月4日，行政院第48次会议审议通过《重庆市开辟火巷办法》对火巷的建设时序与标准提出要求，“甲.火巷应先从房屋稠密之区拆起，并应尽可能利用原有街道，务期与马路衔接；乙.防空隧道出入口附近妨碍交通之房屋，应尽量拆迁火巷宽度为十公尺及十五公尺两种。”开始了火巷建设的尝试。1939年4月15日，工程组首先选择旧市区神仙口至三牌坊以及长安寺至县庙街两线，将其辟为六公尺宽的火巷，并在4月29日完工。不久，“五三”“五四”惨绝人寰的大轰炸发生，主城区第一次遭到严重炸毁，城区原有布局发生了重大改变。国难之下，重庆市民的抗战意志大大提升，严重的火灾也让他们意识到，开辟火巷的重要性，火巷建设工作由此加速。5月5日，蒋介石立即召集在重庆的党政军各部采取措施，紧急处理，从速执行开辟火巷措施，增派工匠，调增火巷数量，经过日夜赶工，旧城区“共开辟的15公尺宽火巷马路14线，计6262公尺；10公尺宽之火巷69线，计14831公尺。拆卸房屋面积达103200余方丈，共拆除大小平房、楼房9600余户”

火巷的开辟加强了重庆的抗火灾能力，抑制了火势的蔓延。但这一举措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极大改变了重庆街市道路的面貌，使原先狭窄拥挤的路面得到拓宽“密集的蜂窝一般的山城慢慢地变得疏朗起来”。火巷的建设也为新建马路奠定了基础。由于应急的特性，火巷最开始不过6米宽，仅用作战时防御的通道。但随着其功能的日益凸显，火巷越来越被视作是新公路的雏形，其宽度也不断增加，出现了“10米和15米两种形式”，“15米火巷更是“成为旧市区的主要交通马路。”凯旋路可视为典型代表，这一在大梁子山脊上完成的螺旋式火巷贯通了重庆上下半城，实现了不同高差区域之间的联系，方便了防灾救灾与交通往来，至今仍在城市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火巷公路的建设还直接推动了城市管理层面的改变。由于拆除火巷导致一些街道名不副实，为方便管理以及提升城市整体形象，重庆市政府对城市街道进行了重新命名，“在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商讨新开辟火巷命名事宜当场决定原则：一、化零为整；二、凡新辟火巷之宽度为十五公尺者称为路，十公尺者为街；三、凡称路之命名以新颖及含有抗战建国之意义为准则，凡称街之命名，可酌量运用旧有名称。”民生路、和平路、五四路、大同路、中华路等便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

（三）防空洞的建设

日军对中国本土的轰炸，几乎与其全面侵华的步调相一致。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用飞机对上海地区进

行第一次大规模狂轰滥炸,炸死平民 1742 人、炸伤 1873 人。此后,日军攻势不断加强,日军飞机在我国领土肆虐,对不设防城市狂轰滥炸。鉴于抗战前线日机的猛烈轰炸与自身防空力量的不足,重庆的防空工作很早便开始筹备。1937 年 9 月 1 日,重庆防空司令部成立,着手于防空情报网与情报战的建设。当月,蒋介石发电要求重庆防空司令部负责指导、协助民众挖筑简易防空壕沟,并明确规定防空壕须深 6 尺、宽 2 尺,上盖木板并厚加土层。11 月 21 日,重庆行营下令重庆市开建防空洞限两月完成。

随着抗战局势的日益严峻,重庆市加紧了防空洞的建设。1938 年 8 月 2 日,重庆防空大隧道破土动工,据规划这条隧道“由朝天门至通远门,临江门至南纪门,横贯老城区的南北东西。隧道共分 7 段,共有 13 处出口,可容 4 万余人”,这标志着重庆大规模修建防空设备开始。到 1938 年 9 月,重庆市区的防空避难设备状况是:“公家所设,有防空壕 512 个,可容难民 63765 人;私家所设,有防空壕 504 个,可容难民 67250 人。且公私两方面,现均继续建筑,其容量当亦日有增加。此外,宪军警及防护工作人员之掩蔽,另有地上防空壕 33 个,岗需防空洞 154 个。至于现正开挖之防空大隧道,第约四公里,出口 20 处,完成后可容七八万人。”

但面对日机的狂轰滥炸,上述准备仍是杯水车薪。“五三”“五四”大轰炸的惨烈伤亡使得政府当局和广大市民都从血与火的教训中清醒过来,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抢救性建设。政府当局“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人口众多、机关稠密的地区开凿公共防空避难设备,并加快了原大隧道工程的施工进度”同时又在市民中进行普遍又广泛的宣传动员,“鼓励那些不必留在市区的机关、学校、团体和个人尽量向近郊和周边各县疏散”。并且还颁布了一些列政策,鼓励民间自行修筑防空洞以辅助整体防空,“建筑防空洞所使用之土地如系公地,一律免纳租金,如系人民私有土地,其地上占有之面积,建筑人应缴纳租金,其壕洞占用地下面积,业主一律不得收取租金。”到 1941 年底,重庆市建成公共防空洞、私有防空洞、隧道等工程,合计 1413 项,可供同时容纳 368503 人^[10]。

防空洞的建设,不仅极大保障了重庆市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也为人类积累了丰富的防空反轰炸斗争经验。还为军工生产提供了安全场所。虽出现过“六五大隧道惨案”,但其积极意义仍是不可否定的。

(四) 城市广场与“精神堡垒”

作为一座山城,重庆的旧城区限于重庆半岛,三面临江,市区呈狭长三角形。旧城区分为上半城与下半城。下半城自朝天门至南纪门沿南城一带,为繁华商业区;上半城自通远门向东,沿嘉陵江一带,面积是下半城的三倍。上半城与下半城的连接之处为小什字。重庆下半城是重庆城市的发祥地。在古代,官署区、商业区、会馆等城市重要建筑均聚集在下半城朝天门至东水门、陕西街一带,沿长江呈带状线型水平分布,而上半城只是普通的商业和居住区域。开埠以来,下半城较早得到开发,重庆主城的商业中心便在主要此处,但其“处处现出凸凹,转折形状,街市斜曲与城垣同”的狭窄空间难以适应日益增长的人口,限制了城市的公共活动。

日军的轰炸使得城市空间布局发生了极大改变,重庆的上下半城在轰炸中几乎被完全炸毁。鉴于以往城市公共活动空间的严重匮乏,在重新规划建设的过程中,更为宽阔的上半城被重视起来,而作为上半场交通枢纽的都邮街成为了改建的重点。为建设都邮广场及加宽天官街、柴家巷,重庆政府“征用土地面积 434.7 平方丈(约 4830 平方米),拆迁民房 128.31 平方丈(约 1426 平方米)”将都邮街和柴家巷“进一步扩宽为 22 米,天官街隧道、人行道从原来的 3 米拓宽为 4 米。”将都邮街广场原定的直径由的 55 米,拓宽为 63 米。这一些列举措使得督邮街成为战时重庆第一繁华大街,在重庆城市商业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并逐渐形成了以都邮广场为核心的新城市中心。

督邮广场的建成为城市公共活动提供重要场所,政治性集会活动日益频繁。为进一步推进抗战精神动员与对民众思想文化的政治引导,在国民精神动员活动不断推进中,“精神堡垒”在督邮广场作为精神象征被建立了起来。“精神堡垒”于 1940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落成。为木质结构,外涂水泥。底座为八角式,分别写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大字。中部呈圆柱形,面临民族路一边,题有“精神堡垒”四字,其余三面分别写上“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上面为五角状,临民族路一面绘有一大盾形标记,中间是蓝底红边,内有一指南针(即“新生活运动”会徽)。其余四方,分写礼、义、廉、耻四字。顶端周围为城堞式,中央设有一大深蓝色磁缸,内贮酒精棉花,举行“落成典礼”那天,缸内火焰四起,用壮声威。当时,正是日本飞机“五三”、“五四”轰炸重庆之后,因为防空关系,“堡垒”一律刷成黑色^[11]。

督邮广场和“精神堡垒”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服务于国民政府主导的政治活动,是为国民政府用以宣传抗战、鼓舞民众抗战士气的政治空间。国民政府领导人在此举办庆典、民众检阅、升旗仪式等系列活动,对于鼓舞民众的抗战热情、提高民众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培养国家观念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战时重庆乃至中国城市的抗战形象。

三、大轰炸时期城市建设带来的影响

（一）促进了旧城的彻底改建，为后续城市的现代化开辟了新的道路

1938年—1941年，日军三年的集中猛烈轰炸使得重庆主城多次变为废墟，城市建筑、公共设施、工业设备、交通工具、车辆船只、公园等市政财产损失巨大，具体数额难以估计；城市人民伤亡惨重，据潘洵对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的最低数据估计，抗战时期日军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的7年轰炸应“总计造成死亡19446人，受伤22427人，伤亡总数41873人”。大轰炸给重庆人民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是极为巨大的，但它既是毁灭，也是新生。“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把我们原想在若干岁月逐渐拆除的建筑新都市的障碍物，经敌机在短期内一扫而空，恢复我们的重新计划的自由，倒给我们彻底改造的机会。”大轰炸将彻底改变了重庆主城城市建筑不甚合理的格局，改善了城市欠缺规划、肆意发展的局面，为城市整体规划提供了可能；轰炸还清除了人们心理层面的障碍，激起了人们的抗战情绪。“宗教的热忱-爱国的情绪、同仇敌忾的心理、只有因轰炸而表现而提高而加强！民族的一切美德平时蕴藏着的-借轰炸而全盘的烘托出来！同生死-共患难-无分男女、无分贫贱的民族团结力。藉敌人的炸弹而锤炼成钢铁般的坚实。”共同的敌人、不共戴天的血仇、家国的危亡，这使得民族凝聚力大大提高，国家利益逐渐被发在个人利益之上，民众积极配合政府工作，为城市的重建积极出力，扫清了主观上了迟滞城市快速发展的阻碍，开辟了重庆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二）以战时抢修的形式磨砺了政府的城市规划能力，为后续的城市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重庆大轰炸中，国民政府在城市规划方面做了有益尝试。1939年国民政府立法院公布《都市计划法》，其中规定了计划区域划分，计划按住宅、商业、工业、行政、文化等类型发展不同的计划区域，同时加强道路系统、水陆交通建设，开展公用事业和上下水道，土地分区使用等，并进一步确定文化教育、体育卫生、防空消防等用地设置，加强自然环境生态保护等，内容比较全面。1940年，4月1日，重庆临时参议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召开，通过《重庆建设法案》提出了“由立体发展而向平面发展”、“由以往一个中心之繁荣，而变为许多区之卫星式之繁荣”的设想。战时建设的经验不断积累，大轰炸影响下的城市建设和所形成的城市发展状态，为战后城市制定建设政策提供了经验和依据。1947年4月28日《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制定完成，主要包括总论、人口分布、工商分析、土地重划、绿地系统、卫星城镇、交通系统、港务设备、公共建筑、居室规划、卫生设施、公用设备、市容整理、教育文化、社会事业、计划实施等18章节。提出了疏散市区人口，降低人口密度，发展卫星城镇等设想，折射出重庆乃至中国城市规划思想和城市建设走向近现代的演变历程和实践轨迹，这对其后以至今天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产生影响和提供借鉴。

国民政府根据大轰炸中抗争的经验，制定了一些切合实际的城市建设法案，对战后中国的城市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但城市的政策未能形成成熟的总体规划，并且在实施过程中，取得的效果也较为有限。《市政感言》的社评，可能就是对那一时期重庆城市规划状况的生动描述“重庆是一个周身伤疤的都市，而市政的设施，永远头疼医头，脚痛医脚……这样一个一百多万人口的都市，身为国际观瞻所系的战时首都，水不灵，灯不亮，路不平，终年闹着偷电抢水的风潮，公共汽车站行列常常拖到半里多长。重庆是一个千疮百孔的都市，它需要彻底的诊治，不要再头疼医头，更不要搽搽红药水就算完事。因此，我们才联想到这‘医生’的制度与职责等问题。”

（三）增强了重庆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为日后塑造巴渝文化奠定了精神根基

重庆大轰炸是一代人的共同的公共记忆，对城市的毁灭性航空打击和普通市民的无差别轰炸使他们不容忘却。当作为历史事件的重庆大轰炸逐渐消散后，作为历史记忆的重庆大轰炸被群体牢牢保留了下来，形成了群体记忆。这段沉重的历史记忆在学术研究开展、新闻媒体广泛传播、影视与文艺作品诠释、轰炸受害者民间诉讼追问等多类社会群体的力量的合力之下，对重庆文化及其体系的形成了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大轰炸中的抗争记忆，凝聚起了重庆人民对于眼下这座英雄之城的认可与自豪，在历史化的建构中形成了重庆文化体系之中的“抗日文化”，奠定了重庆文化革命性的底色。

结语

重庆大轰炸是重庆城市史上重要的时间节点，长达六年的轰炸使的重庆原有的城市发展进程受到严重阻碍，发展速度影响严重。猛烈的轰炸使得城市多次化作废墟，严重损害了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但彻底的破坏也意味着原先积弊重重的城市建设问题有了重新开始的可能，意味着原先混乱无序的城市发展有了整体规划的可能性，更意味着重庆的现代化建设迎来了重要的时期。居民的房屋在轰炸中不断重建；火巷的开辟提高了城市的抗火灾能力，奠定了之后乃至现在的城区道路雏形；城市广场的修建奠定了重庆主城的政治空间格局。总之，重庆大轰炸既是毁灭，也是重生，重庆主城与重庆人民在血与火之中成长了起来。

参考文献:

- [1]潘洵. 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对重庆城市社会变迁的影响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 (6): 4.
- [2]周勇. 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 [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5(1): 104-111.
- [3]向楚. 巴县志选注 [M]. 巴县志选注, 1989.
- [4]隗瀛涛. 近代重庆城市史 [M]. 近代重庆城市史, 1991.
- [5]舒莺. 重庆主城空间历史拓展演进研究 [M]. 重庆主城空间历史拓展演进研究, 2018.
- [6]扶小兰. 论重庆大轰炸对城市建设的影响 [J]. 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12(4): 6.
- [7]何一民. 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城市发展变迁研究 [M]. 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城市发展变迁研究, 2015.
- [8]孙仁中. 101 作战计划与重庆大轰炸 [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12(3): 82-85.
- [9]陈方正. 陈克文日记 [M]. 陈克文日记, 2014.
- [1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 重庆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三辑 [M]. 重庆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三辑, 1982.
- [11]谭刚. 重庆城市广场政治空间的形成与抗战精神动员——以都邮街"精神堡垒"广场为中心(1937—1945) [J]. 抗日战争研究, 2018, (1): 12.

Steadfast Amidst Bombings: Urban Construction of the Yuzhong Peninsula in Chongqing Under the Bombardment (1939-1941)

Yang Zhe¹

¹*School of Ethnology and History,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10691, China*

Abstract: From 1938 to 1943, the Japanese army launched a nearly six-year strategic bombing campaign against Chongqing, the wartime capital. This inflicted devastating damage on the mother city located on the Yuzhong Peninsula: both the upper and lower urban areas were repeatedly bombed, urban infrastructure suffered unprecedentedly severe blows, and extremely heavy casualties and property losses were caused to the city and its people, interrupting the normal evolution of the city. However, in an objective sense, the massive bombings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for a thorough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hongqing's mother city. Through arduous efforts, the urban layout and form of Chongqing's mother city were improved, and the process of the city's modernization was accelerated. This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subsequent urba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Chongqing Bombings; Urban History; Urban Construction